

◎美在生活

慢慢走，欣赏啊

□ 李 勇

审美活动从字面上讲就是对美好事物的欣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花无疑是美的直观形态，也是美好事物的一个代表。植物开花之时是其生命美好状态的直接呈现，所以赏花也是对美的欣赏。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。在对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吟咏中，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生命绽放的赞美。以至于发展出赏花美学，其主要内容是：欣赏花姿色气味的感官品鉴，欣赏花的寓意内涵的意趣赏玩以及欣赏花的生命意义的审美观照。



簪花仕女图

不仅花朵的搭配要有画意，花朵与枝叶也有高低、正奇、疏密的配合，花与瓶之间也要协调。如青铜瓶厚重古雅，可以配牡丹、玉兰等大朵的花，或枝干较粗的铁骨红梅，方显得骨力雄健，古意盎然。

插花点缀案头，花卉便走进了人的生活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赏花由原生态的自然状态走向了精细化的艺术状态。赏花活动也更讲究花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以及时令节奏的合拍。袁中郎就说：“夫赏花有地有时，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，皆为唐突”“凉花宜爽月、宜夕阳、宜空阶、宜苔径、宜古藤巉石边。若不论风日，不择佳地，神气散缓，了不相属，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？”当花卉与周遭环境和时令节气完美相合，营造出的是一种审美意境，花卉的审美特性得以彰显，现实生活也陡然生出盎然的诗意。由此，美就落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。

以花为喻

中国古人对花卉的欣赏不仅仅停留在对其植物特性的赏玩，哪怕是对花卉进行直观呈现的花鸟画中，花卉也都有喻意。文人们对花卉的欣赏多半是由于这些花卉被赋予了特殊意涵。清代文学家张潮说：“梅令人高，兰令人幽，菊令人野，莲令人淡，春海棠令人艳，牡丹令人豪，蕉与竹令人韵，秋海棠令人媚，松令人逸，桐令人清，柳令人感。”可见中国人对花卉的欣赏，不仅在于花卉本身的植物性，更关乎其内涵。这种对内涵的品味把花卉从日常生活装饰点缀之物引入到精神领域，花卉由此而变成精神品格的象征。

当花卉获得丰富的寓意，赏花活动也从感官愉悦进入到悦心悦意的心灵层面。人们所赏之花便不再是花，而是一种人格，一种人生理想。除了人们熟知的“岁寒三友”之类的符号标签之外，花的人格化表达还有一种话语，已经具有意义衍生的功能，在人格化的话语中自然延伸，妙趣横生。《浮生六记》中芸娘曾拿佛手和茉莉对比，说“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无意间，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须借人之势，其香也如肋肩

李渔就是这样把花带入自己诗意的生命状态之中。他说：“予有四命，各司一时，春以水仙、兰花为命，夏以莲为命，秋以秋海棠为命，冬以蜡梅为命。无此四花，是无命也；一季缺予一花，是夺予一季之命也。”这不是一般

谄笑。”这种借花喻人的方式正是将花人格化的表达。借题发挥的议论是赏花的新乐趣。花只不过是个引发议论的由头，妙在赏花人的机智与人生态度的洒脱。

正因为将花人格化，所以赏花之人也应与花相配，审美主客体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审美关系。袁中郎对此特别讲究，以浴花为例：“浴梅宜隐士，浴海棠宜韵客，浴牡丹芍药宜靓妆妙女，浴榴宜艳色婢，浴木樨宜清慧儿，浴莲宜娇媚妾，浴菊宜好古而奇者，浴蜡梅宜清瘦僧。”他认为，每一种花都由相应的人来打理才算适宜，否则就大煞风景。这种花与人的对应关系，也是由花的人格化衍生出来的一种赏花妙趣。花事即人事，赏花即赏人。

与花为伴

以花喻人，将花卉人格化的结果是花已不仅是审美对象，而且是人生伴侣。花卉完全融入人的生活，不仅是生活的点缀与装饰，而且是人生艺术化的实现途径。与花为伴的生活，是审美的生活。袁中郎曾说：“古之负花癖者，闻人谈一异花，虽深谷峻岭，不惮蹶躄而从之。至于浓寒盛暑，皮肤皴裂，汗垢为浸，皆所不知。”这种抛下现实生活中的俗务，不畏艰难险阻而为一睹异花芳容的行为，在世俗的眼中当然是痴是癫，但是这种痴与癫正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。花在这些痴人的生命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伴侣，已融入他们的生命。

陶渊明爱菊，林和靖爱梅，周濂溪爱莲，都是把花当成了生命的伴侣，花与人已难分彼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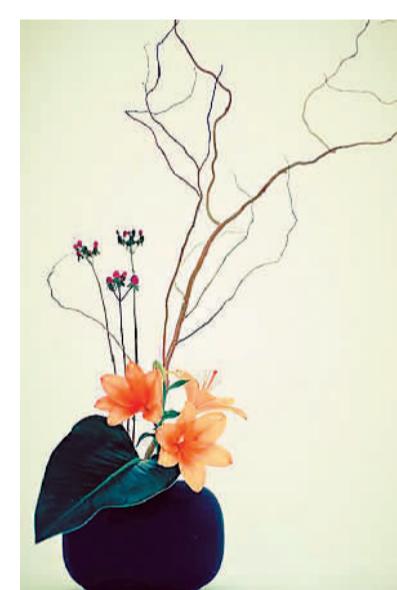
把花卉与生命情怀联系起来，赋予花卉超越性的美学意蕴并不是把花抽象化，而是把花从自然状态引渡到审美的诗意图状态。花仍然是生活之中实实在在的植物，只不过它融入到人的诗意图之中，因而变得意蕴丰厚了。

李渔就是这样把花带入自己诗意的生命状态之中。他说：“予有四命，各司一时，春以水仙、兰花为命，夏以莲为命，秋以秋海棠为命，冬以蜡梅为命。无此四花，是无命也；一季缺予一花，是夺予一季之命也。”这不是一般

意义上的爱花如命的“花痴”的矫情，而是以花为命的美学家对生活美学的形象化表述，也是人生艺术化的宣言。李渔已经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艺术化，他的美学理念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。他的生活美学不是附庸风雅，而是生活在风雅之中。少了一季之花就少了一季之命，不是故作风雅的惊人之语，而是李渔的生活态度。有一年（丙午）春天，李渔已到了“度岁无资，衣囊质尽”“索一钱不得”的窘境，但他仍然不顾家人的劝阻，质簪珥而购水仙。理由很简单，宁短一岁之命，勿减一岁之花！在李渔的人生中，没有花做伴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。这是生活美学的极端例子，却能展现生活美学的意趣与底蕴。

其实，赏花本身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赏花只是生活美学的一种实现途径。但以赏花的态度面对生活，却又是一个严肃的美学问题。美学家朱光潜呼吁“慢慢走，欣赏啊！”也是提醒我们以赏花的态度面对生活、面对人生。以花为伴，把人生审美化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多一份愉悦，多一份风雅，多一份洒脱。这是生活美学的目标，也是生活美学的旨趣。

（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

（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）

西湖无不佳

□ 刘 慧



明黄缎绣云龙纹朝袍 故宫博物院藏



碧玉交龙纽“十全老人之宝”
故宫博物院藏

即使身在别处，乾隆还经常想起江南。73岁时，他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烟雨楼想到西湖，于是提笔画了《西湖图》卷。此卷长约1米，画的是湖心亭，笔墨虽稍显稚拙，但足见其对西湖的钟爱。乾隆在画上题字“西湖无不佳，而此称湖心”，还盖上18个印章。

如果认为乾隆下江南只是游玩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乾隆南巡的主要任务是考察河工与海塘，督促修筑钱塘江海塘。在位期间，乾隆先后耗资白银100余万两修筑钱塘江海塘，第一次南巡到杭州，便登上六和塔观看钱塘大潮；第三次南巡，还赴海塘监督工程。在乾隆御笔《阅海塘记》卷中，他细细总结了从神禹至当时的治水理念及经验教训，并在实地考察杭州沿海塘坝的基础上，阐明柴塘与石塘对于治理海患的不同作用与利弊得失。乾隆的励精图治尽显其中。

乾隆在《御制南巡记》中说：“予临御五十年，凡举二大事，一曰西师，二曰南巡。”可见，他一直把南巡作为生平最重要功业之一。浙江是南巡的最南端。展览中有两幅图描绘了当年西湖行宫的景象，一幅是杭州西湖博物馆收藏的《清乾隆西湖行宫图》，另一幅是来自常州博物馆的张宗苍绘《西湖行宫八景图》。立于旧址上欣赏昔日之景，可以遥想乾隆当年的宏图与伟业。

女娲之簧

□ 喻 琛

被誉为人类音乐“活化石”的口弦琴，极少出现在科普范畴，公众鲜有机会近距离赏析其独特的造型和悠远的音色。“世界口弦文化艺术展”日前在湖北省博物馆亮相，展出和梳理了全球200余套口弦琴及其文化脉络。这也是我国首次大规模、系统陈列口弦文化。

口弦琴，即中国古代的“口琴”，是一种最为原始的古乐器，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系统中，具有抒情、通神、伴舞乃至话语的功能。

《魏书·乐志》云：“女娲之簧，随感而作，其用稍广”，印证了口弦琴起源之久远。

本次展览由湖北省博物馆和中国民族博物馆联合打造，运用现场演奏和声光电手段，让这一展览变得视听兼备。中国民族博物馆目前收藏了来自近百个国家的1058套、1500余件口弦琴，藏品总数位居世界第二位。

本次展出的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套口弦琴。展览现场，征集于陕西长安未央宫遗址的一件口弦琴，形制约半个手掌心大小，琴体、琴弦间无焊接痕迹，是世界上迄今唯一一件金属打造一体簧结构金属口弦。

湖北省博物馆音乐考古研究学者张翔说，口弦琴在我国发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南少数民族。口弦琴的材质经历了从竹片、骨头，到金属的演变，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而因竹片历史久远而难以保存，迄今暂无竹子口弦的考古发现。

“小乐器，蕴藏大文化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范子烨说，作为一种世界性“乐器”，口弦琴映射出各民族的社会生活面貌，是世界文明互鉴的一面镜子。

姿色生香

中国人对花的欣赏首先是对花的物质形态的欣赏。这是直观意义上的欣赏。花影横斜、暗香浮动给人带来感官的愉悦。花香令人陶醉，花色赏心悦目，花的形状婀娜多姿。所有这些植物特性作为审美对象激起了人的审美情感，并不需要多少修养与造诣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行欣赏：清香的水仙，谁嗅到都会感到神清气爽；皎洁的玉兰花，当春怒放，谁见了都会心动。

中国人对花卉的欣赏当然不止停留在这个层次。赏花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，当花变成审美对象后，人们就开始对花进行加工改造，让花按照人的理想和趣味发生改变。这种加工改造也是一种审美活动，一种艺术创造活动。于是，插花艺术便成为赏花活动的一种典型方式。袁中郎《瓶史》中说：“插花不可太繁，亦不可太瘦，多不过二种三种。高低疏密，如画苑布置方妙。”沈复《浮生六记》也说：“或密或疏，或进或出，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。”

家风家训

答禄家族的“成人”家训

□ 顾世宝



太阳汗

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，其领土“北逾阴山，西极流沙，东尽辽左，南越海表”。在此辽阔的疆域里，不仅大江南北的汉族人士结束了百年分离，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交流，从此受到黄金家族的庇

护。抄思长大后英勇善战，跟从拖雷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，官至万户，为答禄氏在元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抄思之子名叫别的因，自幼跟随祖母康里氏在汗廷服役。抄思44岁在大名（今属河北）英年早逝，其妻张氏前往漠北接回年纪尚轻的别的因，在中原汉地加以训导。《元史》记载，张氏曾对儿子讲过做人的道理：“人有三成人：知畏惧成人，知羞耻成人，知艰难成人。否则禽兽而已。”别的因将母亲的教诲牢记心头，承袭父亲的军职后，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名将，不仅立下很多战功，而且所到之处都有惠政。

别的因虽武勇过人，却不因身为将种，就放松对子孙的文化教育。其子答禄文圭（字章瑞）曾到江南为官，与当地文士有交往，元初文人方回有诗《题答禄章瑞净香亭》。其孙守恭、守礼分别于泰定四年（1327）和至顺元年（1330）考中进士，答禄家族至此堪称书香门第。其曾孙答禄与权（字道夫）

于至正二年（1342）登进士第，曾任翰林院经历，是元朝末年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家。元末文人贡师泰的《春日玄沙寺小集序》，记录了答禄与权参与多民族文士诗酒唱和活动的情景：“道夫设险语，操越音，问禅于藏石师，师拱默，卒无所答；清溪虽庄重自持，闻道夫言，辄大笑。”

“从中不难想象答禄与权的多才多艺与风流倜傥。答禄与权‘博闻强记，善谐谑’，入明之后曾任监察御史，他积极建言献策，比如他曾请察祭祀三皇，受到明太祖嘉纳。

“知畏惧成人，知羞耻成人，知艰难成人。”这就是答禄家族著名的“成人”家训。不难发现，女性成员在答禄家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，色目人康里氏、汉人张氏，都不是蛮族，却都在答禄家族发展的重要关头，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，教导子孙成为有用之材。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，答禄家族的后人也纷纷“舍弓马而事诗书”，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洪流。

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）



口弦展品